

公平

EUNOMIA

新世界 新秩序

NEW ORDER FOR A NEW WORLD

著 / 菲利普·阿洛特
译 / 沈 伟 崔炯哲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之神

○ 这是一本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法哲学专著。
○ 阿洛特将这本书的任务定位成——为了提出一项有关社会和法律的一般理论，该理论可能是普世性的，即它能成为所有国际社会的参与者的行动指南。
○ 阿洛特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革命性和想象力，它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有机地融合在一个自成一体的严谨的哲学体系之中。

著
译

公平

EUNOMIA

新世界 新秩序

NEW ORDER FOR A NEW WORLD

之神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平之神:新世界新秩序/(英)阿洛特著;沈伟,
崔炯哲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
书名原文:EUNOMIA:NEW ORDER FOR A NEW WORLD
ISBN 978-7-5118-4809-3

I. ①公… II. ①阿…②沈…③崔… III. ①法哲学
—研究 IV. ①D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157 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版本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廊坊市精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22.75 字数 323 千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张建伟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4809-3

定价:5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软纸版前言

新 世 界

《公平之神：新世界新秩序》出版于1990年。那时，一个长达45年历史的世界秩序的核心特征刚刚消失。那时，“新世界秩序”这一词语为人使用，甚至被一位美国总统用来描述新的国际形势，并且暂时用来庆祝这一新的形势。但是，这一庆祝并没有持续很久，这一词语也迅速地被人遗忘。海湾战争（1990年8月～1991年2月）的简单模糊真是太明显和熟悉不过了。海湾战争似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以联合国安理会运作为机制的新的后冷战时期。但是，它的起因和全球战略意义很快被视为与国际大国在中东角力一样古老，与1945年前后的不计其数的国际冲突一样了无新意。

冲突是最通常的方式，伊拉克使用武力主张其旧有的权利，声称科威特是“丢失的省份”，科威特捍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国际社会以集体行动支持科威特（一小部分支持伊拉克），保卫石油进口国的关键经济利益，大国主张特殊国际责任，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如此分析，甚至连最乐观的观察家也未必能够在国际关系的漫漫长夜中看到新的曙光。

《公平之神》一书的写作完成于终结冷战的事件发生之前的1989年。只有在前言部分才有可能提及“主要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东欧的政治发展”。然而，也有可能提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近的表态及教皇二世呼吁新世界秩序观的倡议。自1989年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在1989年所不能预见的变化。这一发展的微妙及深远使得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和必要。这就是《公平之神》一书期望贡献和形成的新视野。

七个月的海湾战争相当于在更悠闲岁月之中的七年之战(1756~1763年)或者是法兰西—普鲁士之战(1870~1871年)(另外一个七月之战)。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最终都是由一个人的行为激发的,但是海湾战争的起因和影响远甚于其他战争。每一场战争都是转型之战,或者用丘吉尔更生动的话说,是命运的铰链。七年之战是一场守旧之战,是后中世纪欧洲社会秩序的最后之战。它为美国和法国革命以及结束古代统治的英国的未曾宣告的革命(1820~1832年)奠定了基础,更不用说它对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影响。相似地,法兰西—普鲁士之战为法国政治制度的共和化和此后更加血腥的德国政治制度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十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场守旧之战——海湾战争,既是一个终结亦是一个开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一种新的世界无序的开始。

战争的规律

冷战是在五个层次上进行的,是一个五连环。心理战使用信息、意识形态、低层次文化,甚至是高层次文化作为准军事武器。隐蔽战使用间谍、颠覆和其他更加冷酷的手段去伤害、破坏稳定。战术性地创造一些例外的持续的国际危机形势是在永无战争状态中的神秘和不可测的大游戏。这在中东、东西德、东西柏林、南北韩、非殖民化中得到了体现。公开的战争也包括偶尔的暴力间谍活动及白刃战(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现代化武器和常年的暴政可能导致无用的结果和重大的人员伤亡。五环中的一环即是大威胁,核武器的威胁,所有威胁的威胁,包括令人深受鼓舞的但又虚幻的互相裁减军事竞赛的承诺。

冷战交互的道德理论是一个霍布斯自然法(Hobbesian Natural Law)的初始形式,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的公理或训诫引申开来的三个谨慎但又矛盾的原则:(1)最终结果使手段合理化,即使该手段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2)自我保护要求自我保护的终极手段,即使该自我保护的终极手段可能最终意味着自我的毁灭;(3)经济附属于政治,政治附属于军事。修辞学家和学术界可能提及两个第一世界、一个第三世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但是实际上国际政治分类学在主要决策者脑中更为冷酷。我们,他

们,麻烦制造者和无关紧要的人。

换言之,冷战的世界观是一个被简化的世界秩序,一个冷酷地还原到荒诞的,在16世纪早期就已经演变成形的广大多元的社会形式之中、公共领域的控制者之间竞争和冲突平行共存的欧洲国际秩序,这个秩序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多元化,智慧和愚钝的程度和形式多元化。在充满概念困惑的后冷战时代,我们可以回首我们业已失落的世界,一个疯狂但又清晰的世界。

对那些未曾经历过冷战,或者那些开始遗忘在冷战中生活的日子的人来说,很难想象或回忆起所有错误的幻觉。对核武器、越战、部署巡航导弹、星球大战计划或一系列武力干涉和代理人战争的反对,如果可以完全表述出来的话,可以被概括为非忠诚的、不爱国的和叛国的几类。但是,如此简单地对概念的描述可能有利于建构残酷敌人的目的,甚至有利于建构残酷敌人所喜好的概念。异见人士在东西方的个人结局截然不同,就如控制意识形态的公共意识的形式和程度那样,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对灵魂的压抑。

新的精神秩序

1989年以后世界的一个首要特征是深刻的心灵解放,不仅出现在那些以前由共产主义掌权的国家,也出现在那些非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这类解放的第一次爆发是对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实验否定的庆祝。奇怪的是,心灵压抑的终结已明显地减少了可能提供的社会哲学。如果历史可以被视为寻找理想社会哲学的一个长期和痛苦的搜寻过程,并且考虑到民主—资本主义可能自己表明是唯一适合这一寻找的合理解释,那么有人甚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驳已经引起或导致了历史的终结。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资本主义迅速被视为领导性的标志,因为它已被验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如同软饮料和高性能汽车一样被成功地推销出去。

销售知名商标产品不是用智慧而是用想象力。如果产品可以表明它能够适应于其创作意识,其他的主张就不再必要。民主—资本主义导致一种引发全球高期望值的革命,这不仅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真实世界的效果比任何社会哲学家的话更有说服力。产品的证据在于领先的实践者的

4 公平之神:新世界新秩序

财富不断增长。它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上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是一部永恒的制造快乐的机器,挑战似乎是人类历史中艰苦的教训,如果不是其实体性的法律,如果至少不是被资本主义反面教材不断冲击的有趣的不幸持续增长马克思主义法则。

冷战虚假的原则的终结导致了另一种思想解放的形式,从而重新主张被压制的国民身份。冷战中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后帝国的帝国主义。冷战时代的支配力量控制了国民身份,就像19世纪帝国力量那样坚固而残酷,从被分割的德国到以色列、巴勒斯坦,从苏维埃的亚洲共和国到南斯拉夫。民族主义是来自于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强有力的意识效果。它藐视分析,只能由暴力加以限制,并通过创造某种形式的依附到某种形式的在主观性方面超越民族主义的社会结构,从而升华民族主义升华。

冷战中政府间权力关系(主要指军事集团内部之间或军事集团之间)的仪式化的终结使得在国际事务的讨论中出现了其他声音。不仅是在正式的极权主义的社会而且在所谓的“西方”社会,政府发现他们不再对国家战略目标和国家战术政策方面拥有唯一的发言权。特别是,它们隐蔽活动的能力和其他非透明的和非可信的国际行为大大减少了。就国际范围而言,非政府组织、自行任命的和不确定的代表权威发现它们自己能够参与甚至影响国际决策过程。不断加强的媒体通讯和国际讯息计算机网络的国际化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种公共发言的平台,其主要特征是跨国界的或非国家化的,并且超越了那些希望寻求控制国家公共意识的人的社会控制和法律控制。

冷战特有的外交政治形式是冷酷的强迫形式,直接建立在以使用军事力量作为威胁的基础之上,让步于一种新的强迫形式,经济政治。政治经济学再一次展现了它作为主旨教义的神学力量,正如它在大西洋两岸,自维多利亚时期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秩序中业已成形的那样,一个普遍的超越于文化多元性的宗教,并伴有其自有的形而上学的抽象论和道德哲学。为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宗教,一切自然的或人类的东西都是商品,有经济价值和可以协商的价格,从哲学主张到大气污染,从人类胚胎萌芽到孤儿,从科学假设到高级文化产品到政治家的个人野心。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价值总的来说是经济价值,而美德则是经济价值的成功的制作和营销。当国

家被视为完整化的经济体系时,对个体经济角色而言是真实的东西,并不亚于对政府作为国家的国际活动的经理人这一角色而言是真实的。从这一观点看,外交是经济通过其他方式成功的延续。

经济原旨主义的一个有趣的副作用已经表现为,“发展”一词已经失去了大多数的符号语言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是在冷战时期获得的。这个词已经成为尊重政府的暗语以至于只要政府在声明、条约、计划、一般辞藻中继续使用这一文字,它们就可以尽其最大可能而不实际分配财富,更不用说解决这些社会的许多问题了,而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在殖民主义退却以后遗留下来的。经济学的教义是相信经济自然主义,假设社会问题会得到解决,或多或少地、不可避免地、同时地被经济进程解决。如同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那些社会的健康和快乐所要求的以及那些持续的社会苦难所没有要求的“必要的结构变化”。

由于经济现象至少具有自然现象(如海、河和空气)的性质,它们一般不会自然而然地尊重政治界限,经济主义的增长已经超越了主要经济企业的经理人和国家政治家的概念界限。“环境”一词具备了一些符号功能,而这些功能正是“发展”一词已经失去的,取代了“发展”一词在声明、条约、计划和一般辞藻中失去之后遗留下来的空缺,甚至是与“发展”一词共葬,以“可持续发展”一词提供不同的语境服务。政府可以再一次利用它们的实践技巧大谈“环境”以便尽可能少地从事某种工作。这种技巧已经被使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用来严肃地说明“如何避免战争”和“和平解决争端”。另外两个类似的词语——“国际社会”和“国际安全”已经被用来服务于另外的时代,以填补在“敌人”无处不在的世界中,“防御”和“集体防御”的概念倒塌之后留下来的真空。然而,文字帮助形成了概念的范围,这些文字由于它们不可避免的普遍适用的含义,可能表现了正如政府自己理解的政府间关系的公理性的基础中发生的真正变化的表象。

地理政治学的蜕变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遗留下来的国际体系

使得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同叮在烂肉上的苍蝇。世界上的纳税人支付了或多或少、没有意识到的或看不见的税款。他们经常忙于自封的任务,一些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另一些则没有太大成功或毫无建树。自1990年以来,似乎有另一个地理政治学时代留下来的巨大阻塞物。问题是,至少在最发达的社会,政府的一般功能在经济主导的社会已经经历了主要变革。政府更多的是成为国家经济的经理人,用立法和行政手段尽可能有效地为公民的物质福利服务,以使国家这艘大船继续浮行,以超越最接近的政治或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传统的政治过程在与社会其他的子系统(sub-systems)相比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这些子系统不仅包括经济而且包括其他意见形成和价值形式的一般体系。在这样的社会里,选举已经越来越成为不同管理团队之间的一种选择。选举过程的管理本身就是公共管理经验的一种测试,是一种令人羞辱的仪式过程,而不是对不同政治模式的严肃选择。最具有政治抱负的政府间组织机构,如联合国或欧盟,充满了过时的政府绝对主义的氛围。而越来越少的组织仍在呼吸官僚和政府绝对主义的过时的空气。

自1990年以来,这样的组织盛行一时的局面已有所改变,这是一种政治地理学蜕变的转型。这一转变涉及内部和外部、国内和国际的界限。在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直至1945年),外界(殖民地)被内化为所谓母国的主权,许多母国内部的社会现实也流向殖民地,包括社会系统、法律和总的社会强制性的价值。但是,在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被严格地分开,战争和所谓的干预被不规则地定义。最近,内部外部化和外部内部化已经变得很正常。“全球化”这一术语未能抓住新的国际社会机器的双向行为的特性。“独立”一词未能抓住多元化的特性。不仅是国民经济,社会的现实在最广的意义上也已经形成了外力作用和影响与内力作用和影响相同的局面。政府管理内部范畴和通过外交及政府间组织进行外部合作已经被一种更加复杂的现实所取代。

这一新的地理政治的形态学的突出结果是中世纪以后的制度,比如众所周知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已经像1789年革命以后法国的议会或农业税一样陈腐过时。需要通过一小部分精英(为此目的而特别受雇)来代表整个国家的人民发言的想法,以及应当在或多或少拥有自我意识的君主之间

有一种浮躁的人际关系之间的怀旧的关系,现在滑稽得都有些不真实了。这些“关系”可能不时导致国家利益(战争)中的大屠杀和大破坏的插曲的事实应当被视为正常合理的,但现在不具备可信度。

先前的“外交政策”已经被我们称为外部政府或国际政府的社会进程所替代,这一过程是国家政府进入政府功能交错(国际社会)的领域的持续的目标、功能和方法。国家公共组织现在通过政府间机构的媒介直接互相对话,以至于世界上的行政边界不再与想象中的政治边界相吻合一致。先前所知晓的“国际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外部政府方面的专业化实践。旧式的对外政策和外交现在已经成为对于被边缘化但不可矫正的国际统治下位阶层(sub-class)来说一个旧式的游戏,一些政治家和公共官员仍然沉迷于危险的游戏之中。

新政治地理学蜕变的另一个结果是,国际法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一个长期发展成熟的变化。必须承认,这一变化现在成为了变化的国际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似乎有两种国际法。旧的国际法,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是政府对彼此之间潜在的冲突行为的最谦逊的自我限制,因为它们意识到新“国家”的出现,解决彼此之间土地和海洋边界的界线和它们各自国家法律制度的界线,解决可能在日常“关系”中产生的争议和不和谐。新的国际法是一种普遍法则。

旧的国际法是特别得到政府和它们的顾问认可的,被海牙国际法院供奉的法律。新的国际法在无数个国际场合中制造,通过无数个国际机构加以执行,并由无数个新的国际法院和法庭解释并适用。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国际法由国家立法机关重新加以制定,由国家政府的行政部门实施,并由国内法庭强制执行。我们现在开始能够看到旧的国际法实质上是不成熟的国际宪法,为国际社会的初步形式提供基本结构,同时国际法院是一种初步形式的国际宪法法院,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立法院。

我们现在开始能够看见,新旧国际法一起形成一个正在成形的、超越可以想象的国内和国际界线的统一法律体系。几十年来就有结构上反常的事物,至少困扰着思维更为严谨的国际律师。国际人权法只在国家宪法体系中作为适用法。海洋法的具体实体规则和逐渐庞大的环境法仅仅在它们被

视为政府内部行为和非政府角色行为的一般约束时才有意义。国际贸易法是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但是越来越多的详尽的实体规则必须通过内部加以制定和执行,并且具有非常实质的内部经济效果。国际刑法的新发展要求政府接受这样的事实:政府可能为其内部行为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它们必须(在国内法院面前)对其根据国际法规视为犯罪行为的内部官方行为负责。

最后一个趋势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分析的那样,和平维护和和平制造之间的术语区别在国际事件中具有重要、明显和异常的成果,不仅仅是在前南斯拉夫这一内部宪法秩序已经被破坏殆尽的国家。“国际安全”这一空洞的外交概念正在变化成为一个古老的空洞的宪法概念“公共秩序”,以至于在国家之内,内部宪法秩序或者大规模滥用宪法权力可能被视为威胁到国际社会的国际公共秩序,至于国际社会甚至国际法都不能忽视它,如果这样一个概念被视为一个从外部介入到受到破坏的国家内部宪法秩序的合理解释或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合法化,那么地缘政治隐喻的深层次结构变化就会发生,这些变化超出了在国际联盟所微弱体现和联合国宪章中更大胆提及的国际安全的普遍性关注。国际间政府会成为国际政府。

一种新的国际法律制度的现象远远超出了传统地被视为“国际”的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不仅在国际法层面,而且在国内法层面,特别是在国内法律制度共存的层面,在总的法律现象的性质中察觉到细微的变化变得可能。

前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复合体的社会的实质性的社会重建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个在更久以前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被深深认识到的事实。尽管它们有着“自由”的终极价值,民主和资本主义都要求大量的法律和行政部门成功地运作。法律和公共行政是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即使它们同时也是保证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行使个人自由,而这些方式也必须是对个人有利的。这些社会转型也反映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依赖,两者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宪法二元素,民主进程可以非常有效地提供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法律和公共行政的量,这种效率被认为包含了产生在合法性下的对法律和行政充分的默许程度。

这一事实令人震惊的结果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所有社会的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体系可能被视为一种普遍的利益,两个国家经济之间双边经济交易的每一个案是由双边决定的,而且必须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层面上决定,国际社会的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性体系。日渐清晰的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首先是一个法律体系,其需要某些法律机构,法律实践和各类实体法,公共和民事的、刑事的,从人权法到公共行政法,从合同法到证券法到知识产权法,从竞争法到内幕交易法、反洗钱法。接着,普遍性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法律制度的普遍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资本主义法律具备了一些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人权法所取得的特性。正当人权法已经创造了实质性的但又是脆弱的国际标准以控制国家宪法体系中公共权力滥用的时候,资本主义法也开始建立实质性的,但更加坚实的国际标准,以组织一个资本主义或者部分资本主义的经济。一个类比也可以从上述的逐渐形成的国际公共秩序的概念中得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概念逐渐形成,这是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表征并由此强化(但并非单一起因)。至少,对那些相信民主和资本主义双重不可分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应当尽快地建立一个以实质性的国际标准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一个国际民主秩序的概念。自 1975 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以后,同时也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传道者的过度热情,有关民主理论的讨论会和宣言,甚至是民主的顾问和观察员,都将福音广为散播。这使得建议国际法本身可以包括根植于普遍国际法规则之中的指导性的民主原则成为可能。

这些发展的进一步结果是,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本身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商品。对许多律师而言,特别是精通商法的律师而言,法律领域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法律制度、实体法和法律服务中的进出口业务,一种本身可以对国际法律顾问、自我全球化的律师事务所产生利润的贸易。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在激烈的国家经济竞争中创造的新的比较经济优势、比较法律优势的手段,如果贸易伙伴的法律制度可以更符合自己的法律体系而不是另一个竞争者的法律体系的话。

这些方面可以说明,当所有国家的法律体系同所有国家的经济体系互

相作用时,一个正在形成的普遍的法律体系应负责与正在形成的普遍的经济相适应,并且可以作为国际法实施的代理人和跨国经济交易的实质基础,也即可以涉及适用一个以上的法律体系的经济交易的基础。

国际宪法主义

当国际法律体系中的这些发展被搁置在上述讨论的国际政府间体系的新发展一边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一种概念上的不规则所影响的国际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国际机构的合法性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时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组织被更激进的批评者视为获利国家中的深层次结构性社会变化的高傲的代理人,而不仅仅是公共财政的最后的渠道。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当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种协议)转变成世界贸易组织(一个组织)时,它也被更激进的批评者视为集体经济帝国主义的新形式。甚至是欧洲联盟,即使已被证明在严格的经济领域之外扮演着非常无能的国际角色,在促成南斯拉夫解体的宪法结果方面仍扮演着一个决定者的角色。甚至经合组织,一个经常遭人(不包括最有信息性的公民)忽视的政府间组织,能够引致剧烈的批评,特别是在它制定一些保护外国私人投资的规则之后,其被视为一个秘密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寡头政治。

在一个逐渐统一的经济体系的世界中,在一个更加复杂和具侵略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世界中,在一个主要经济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经济角色的世界,伴随着发挥作用的国家中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效果,我们面对着相同的问题,那些在国家社会中出现的,但是以不同方式并在不同时候,由它们不断增强的复杂了的和更加精深了的现代工业和商业经济体系产生的类似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不断的巨大增长的集体社会能量,在城市化的影响下,以及在城市中产阶层不断增加的财富和能量的基础上。自由民主的发展,与有形或无形的能够使民主自由成为可能的复杂的社会程序,是对这些经济发展的一个回应,组织经济发展并使经济发展合法化。这至少是那些城市中产阶级的看法。在国际社会层面进行这样的社会重塑的挑战在各

方面都不相同,当然也不会更加简单。

这个挑战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否看见一个正在形成的国际社会公共意识的信号,因为在社会公共意识中社会储存有关自身和其高价值观的主张,在社会公共意识中意识和价值观处于永恒的争斗之中。本书提出的假设建议,一个社会构成自主体系,不仅仅是以法律和法律到底的形式,不仅仅是在真实世界的争斗中,日常生活中政治、经济和人物之间的争斗中,而且是在社会关于意识的争斗中。21 世纪国际社会的自我构成不会有所不同。

现在,国际社会自觉意识的基础设施十分庞大。国际化的大众媒体通信,包括全球新闻服务。国际化连接的计算机属于公共机构、商业公司和私人个体。国际化的大众文化。国际化的文化和学术文化。一体化组织的宗教。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众旅游,包括在正在形成的一体化经济的自觉意识的交换,包括应普遍性要求而产生的普遍化的产品的过程。

学术文化的自然普遍性和经济现象的自然普遍性,科学以及工程的正在演进的广泛性,已经在国际社会自觉意识中整合成一个领袖权威和权力的场所,这两个多世纪的产品已经为革命性的社会变化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并且扮演了一种实用主义的默认哲学的角色,换置,至少是代替失去了传统的国家社会哲学的权威,宗教的和世俗的;并且,在效率方法的范围中而不是在文化绝对目的上提供了在国际层面上的人类发展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它们正在重新形成和统一所有那些正在找到自我利益和产品(而科学和工程正好能够提供的)的人的自觉意识。

国际社会意识的基础设施大多数是采取机构的形式,尽管包括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机构(政府、公司、教会、职业团体、大学和研究机构、公共利益团体等)的事实已经导致许多人开始讨论正在形成的国际市民社会。对那个术语,现在几乎是与国家社会体系有关的常规政治分析的陈词滥调,必须谨慎地看待。这个术语,至少是英语和法语中,被 19 世纪早期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市民社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使用过。是黑格尔概念占据了现代意义上的这个文字术语的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与“国家”这一文字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合理化的形式形成了对比。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一对比

对关于至少一种正宗的自由民主观而言是异端。自由民主正统观点是建立在这样的意识上,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人们是通过代表机构或由代表机构控制的形式进行管理的。将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与随意挑选的个人利益、特别利益和公共利益自我指定和自我合法化的(“市民社会”),或多或少机构化的,且代表简单共存的道理介绍进国际社会,就是批评国际社会是非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系统。这至少从一种自由民主正统观点来看是如此。

国家社会的革命性转化意味着人民从公共权力接管了权力,而不仅仅是通过“公共观点”的发展作为宪法之外的机构,不仅通过新的机构,而且通过以普遍的精神力量的形式上升,一种意志的改变,这意味着人民不再被国家视为对象,公共权力会被视为人民授予的。特别是法制逐渐被视为人民控制和授予以及实施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发展一个合适的国际宪法主义的想法和将这个想法法定化的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和制度上,在国际社会中,特别是在21世纪面对国际社会公共意识而言,现在已经显示出成为最难克服的挑战之一。

在帮助构建一个社会的理念之中,一个特别的传统称谓是理想诉求。我们的理想诉求允许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并且设计革新我们世界的途径,这些促使我们试图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逐渐形成的被解释为人类理想诉求的普遍化的东西。其发展所引起哀愁的地方在于,它被称为社会沉渣的普遍化的东西所纠缠。在理想诉求的理念和沉渣存在的事实之间的角力就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一个社会没有理想诉求的理念最多是一个静态社会,或者更可能是一个自我毁灭型的社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焦急的同时又满怀希望地为将国际社会理想化而寻找出路,这种社会在早前至少已经由传统史料编纂显示的那样是由公共权力掌控者所填充的愚笨和罪恶的堆积。

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理想诉求,正如我们自己找到了对我们所见的人类世界的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清楚的方式残酷地注意到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丑恶的事实。我们被迫面对各种人类灾难和社会动荡——战争和内战、种族屠杀、大规模驱逐、贫困、饥饿和大范围的疾病、各种公权力的滥用、各种社会压迫、经济掠夺和道德沦丧。这

些被带到了那些享受着舒适生活而沾沾自喜的人们的客厅里,他们看着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苦难,那些苦难相对于我们自己社会的结构性不足而言成倍地扩大,甚至到了不可想象的苦难程度,影响了数量无法想象的人们。通过更加有效的全球联系的手段,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些东西,就好像看到我们的邻居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被迫记住我们的理想诉求,包括正义、社会公正、平等、人类性的尊严、自决、自我表达、自我实现、人类繁荣、健康、快乐、社会中良好的生活。我们被迫记住,我们人类性的同情心和我们的道德责任并未被限制在那些我们的近邻之中。

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见证的如此痛苦的社会灾难激发了许多人面对人类苦难无助的感觉。成百万的人被激励着各自采取慷慨和直接帮助的行动,去体验断断续续的恶心和愤怒的情感。但是,苦难是如此严重和普遍,它们的起因是如此复杂和永久,可以获得的社会救济是如此不足,以至于我们毫无选择而不得不延伸到全球范围的我们在自己社会中所做出的一般道德妥协——忍受,时而后悔,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后果,重新用懒散的自然主义确定自我——社会灾难最终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一社会信仰,这是一种懒散的个人主义,一种改善社会的主要责任建立在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基础之上的信仰,也就是说,差不多是相同的那些人,在人类历史中,对世界上的人民和民族所承受的社会苦难负责。这样一个现实道德妥协使我们承受着一个永远的道德压力,这种压力是我们不可逃脱的、事实上的经验和理想诉求中可清除的意识之间的压力。减少世界范围的社会苦难是国际社会在 21 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理想诉求的意识的普遍化是认识和面对这一挑战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能够说出一个正在形成的普及的法律体系,国际宪法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国际社会意识的第一个标记,也许甚至包括理想诉求和意识,我们也必须说出它们辩证的反驳论,即逐渐形成的国际无政府主义。我们有非常足够的理由去考虑冷战时期引起的或者与广泛的非常有力量国际反社会力量的上升相吻合的虚假的纪律和错误的意识的终结。核武器扩散和远程导弹运输系统,至少实质上与先前的国际武器贸易没有两样。灾难性的社会体系,充满了大量的结构性的社会不公。腐败、高傲、有时候部分

“民主化了的”、有时虚假的民主化了的无能的政府。政府有时不比犯罪集团好多少,它们是一个腐败和贪婪的特权阶层。国际有组织犯罪,通常与腐败的政府有关联,纠缠于合法的国际经济黑暗的边缘地带。政治或者一般意义上公共生活的败坏,甚至是在那些有最完善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失去基础,以及一个不断下降的坚信政府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及合理管理社会变化的信仰。全球范围的道德腐败的蔓延,通过败坏了的大众文化和最拙劣的资本主义形式。不合理主义、物质主义、犬儒主义及实用主义如同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贬值了的价值体系。

所有这些已经伴随着一个更加普遍的反社会威胁,国家社会对国家社会现实失去控制。当跨国现象逐渐失去本地化时,它们开始逃离本地化的社会控制,包括社会高级价值观(如与淫秽出版物有关的)和实质性的法律——经济结构(如知识产权)。“全球化”,作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陈腔滥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全球化社会整合和全球化社会分化,世界有序和世界无序。

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从 20 世纪继承下来的新世界就是如此这般,一个永远变革的以压倒之势的多元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渐进的社会。没有两个字的词组或简单的公式可以概括这一未成形的能量。一个就目前自我转型的国际社会的临时总结可能代表了这些过程的一种过程。一套相当完全的心理强势领域,在许多复合的变化语言中重叠和交互作用,消灭、重新加固和超越彼此,在不断上升的期望的变革中又有不断下降的期望的变革。

- 过去的力量,或好或坏,已经创造了我们找到自我的人类世界,并且决定我们希望在未来拥有的人类世界的潜在可能。

- 一个正在形成的普遍的关于全部人类性的社会意识(公共意识),创造一个全部人类的真实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使用科学和工程学的福音,但同时威胁危及所有附属于社会意识的形式。

- 社会丑恶的普及化,正如因为社会体系和公共权力拥有者所引起的人类苦难被扩大化那样,正在发生着跨国的甚至是全球的效果,国家社会现